

# 发达经济体“新平庸”对我国影响几何

□ 张晓晶



### 经济学家用“长期停滞”来描述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的新特征，其经济增速由危机前的2.63%下降到了危机后的0.51%

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的种种表现，最能抓住其特征的表述，当属“长期停滞”。这个由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重新阐发的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强烈关注和共鸣。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布兰查德等纷纷表示认同。

“长期停滞”一词最初是在1938年大萧条快结束的时候，由时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阿尔文·汉森所提出的。他指出，大萧条也许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没有任何自然力量将推动经济走向充分就业，会出现一个持续失业与经济发展停滞时期。汉森认为，主要由于出生率的下降以及过度储蓄抑制了投资，进而使经济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萨默斯借用这一概念，用于描述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的新情况，这包括潜在增长率的下滑，以及与之相伴的低通胀、低利率、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债务不断攀升等现象。

首先是潜在增长率下滑。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危机前(1999~2007年)平均增速为3.89%，危机后(2008~2013)为2.8%，下降了约1.1个百分点。同时，危机使得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下滑更加严重，平均增速由危机前的2.63%下降到0.5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自2007年开始，美国的潜在增长率水平逐年下降，并导致2014年的美国GDP水平较之2007年作出的预测值低出近5个百分点。欧洲的状况显然比美国糟糕。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显示，1992~2007年，欧元区GDP实际年均增长率为2.08%。而在危机开始的2008和2009两年，其经济就出现了较美国更大的衰退，平均增速为-2.03%。在此后的2010~2019年，欧元区经济虽然可能有所企稳，但年均增速仅为1.12%。低速增长成为常态。日本经济经由安倍政府“三箭齐发”，其增长曾在2013年有所回头。但是，由于造成其增长颓势的长期因素均未能有效消解，加之“三箭”中多有引火烧身的药方(如人为造成通胀)，其政府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仍将延续。

其次是低通胀率与低实际利率。美国与欧洲地区的经济体都存在一个较低水平的通胀率，大约都在2%附近。美国实际利率平均水平由20世纪80年代的5%下降到90年代的2%，21世纪实际利率只有1%，而从雷曼破产

之后，美国实际利率水平只有大约1%。欧洲地区的实际利率也从由20世纪90年代的4%左右下降至21世纪初的负值。

第三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1900~2012年，美国年均全要素生产率经历了一个倒U型发展。在经历了1930~1970年的快速增长阶段后，直到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处于下降阶段。而欧元区主要经济体虽然各自的全要素生产率状况不尽相同，但都处于下降趋势，并且欧元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其它发达经济体。

第四是债务水平居高不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数据，在2007至2013年间，所有七国集团成员国的政府债务与GDP之比均有程度不同的上升。其中美国、欧元区、日本和发达经济体整体的该项指标分别攀升了40、29、60和33个百分点，这也导致了在危机后私人部门开始去杠杆的同时，经济整体的杠杆率还在继续上升，甚至在近年来增幅都未明显回落。

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GDP比率有攀升势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官方数据估计，未来美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将远低于其预测的水平，税收收入将放缓，这使得2030年左右美国的联邦债务与GDP的比率将达到近150%。据欧洲中央银行相关数据，欧元区的债务/GDP比率同样处于上升态势。

### 技术进步放缓、劳动人口减少和“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收入分配趋势，抑制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潜力与社会活力

造成长期停滞的原因，可以从技术、人口与收入分配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是技术。无论是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实践都表明，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在于技术进步。而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造成长期停滞的主因之一便是技术进步的放缓。如美国经济学家戈登测算，美国全要素生产率早已重回1930年代前的历史低位：1980年至今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仅为0.5%，约为1930~1980年间增速的1/3。另有研究显示，欧洲、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自身的创新能力有限，而对美国的知识技术外溢依赖较高，所以也步美国后尘，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程度不同的生产率增长减速。关于上述普遍的技术进步放缓的成因，戈登认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科技创新成果，如互联网和个人电子设备等对产出效率的提升作用，远远小于一个世纪前电力、内燃机和自来水系统的发明应用。

其次是人口与劳动力市场。由于人口生育率下降、预期寿命提高、战后婴儿潮一代退出劳动市场等因素，新世纪以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了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困境。如在1972至1996年间，美国劳动参与率年均增长0.4个百分点。而在2007至2014年间，该指标年均下降0.8个百分点。仅这一变化就导致美国人均GDP增速下降1.2个百分点。相对美国而言，欧洲、日本的劳动力供给状况则更为悲观。自1990年代以来，由于老龄化和少子化等因素，欧日两大经济体的劳动人口相对比重下降的趋势不仅更为明显，且持续的时间远较美国更长。

与此同时，疲弱的经济环境，则进一步



削弱了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参与率。如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基于美国的研究显示，与衰退相关联的失业并不会随着经济复苏而完全恢复。人力资本将在失业中就此永久性的失去，劳动参与率也随之降低。此外，战后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普及程度迅速提高，其中所积累的大量人力资本支撑了战后的经济复苏与繁荣。但自1970年代始，进一步普及教育和提高人力资本的潜力趋于消失。戈登的研究显示，这种现象在美国尤为严重，特别是在高中和大学阶段的教育普及率上，美国均在发达国家中居后。

第三是收入分配。日趋恶化的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抑制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潜力与社会活力，成为导致长期停滞的重要因素之一。实际上，如长期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皮克提等人的研究显示，早在经济繁荣的大稳定时期，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持续恶化。尽管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中，这一局面曾暂时逆转，但其长期恶化的趋势并未改变。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不公平的代价》一书中也指出，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30年间曾持续改观，但在最近30年来却不断恶化，并且情况比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更令人堪忧。如在1979~2007年间，即使在扣除税负后，美国前1%的顶层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了275%，而前21%~80%的人群收入增长则低于40%，而末端的20%人群收入仅增长18%。“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趋势可见一斑。需要强调的是，如此的分配格局不仅会造成社会动荡、阶层固化，更会严重挫伤市场的创新创业活力，阻碍人力资本积累，抑制消费需求，加重财政压力。

### 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在当下及今后的竞争，将会是一场持久的全球改革竞争和创新竞争，我们要力争比他们更快地完成调整

如果未来较长期时期发达经济体陷入长期停滞的状态，那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写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内涵，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妥善应对。

首先，准确评估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平心静气接受新常态，不可急于求成。发达经济体已经步入了以长期停滞为典型特征的新

阶段，而中国经济也正步入“结构性减速”通道，这是无法通过短期政策调整来改变的大趋势、大背景。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依靠外需的迅速回升或海量的政府投资将GDP增速拉升到过去的两位数。今后的政策重点应当是在接受7%的中高速增长新平台的前提下，将政策重点从熨平短期波动转向关注激励、竞争、技术进步以及资本形成等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潜力的长期因素，大力实施放松管制的政策体系和激发市场活力的改革举措，通过长期努力，切实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差距。

第二，长期停滞会使发达经济体通过各种途径寻求增长新动力，引发全球新变局。一方面，发达经济体也将利用在全球游戏规则中占据的有利位势，为本国企业谋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从而获取增长新动力。例如，美国积极争取将“竞争中立”内容写入双边或区域性贸易协定，给中国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等等。虽然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平台上已经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发言权，但依旧不能改变旧的全球规则，新兴经济体在很大程度上仍只能接受霸权国家设立的各种非中立规则。未来中国需要在全新规则的制定过程中更多地发挥主动性、主导性，增强国际话语权。

第三，增加公共投资成为发达经济体走出长期停滞的重要选择，这将会为中国海外投资提供机遇。鉴于非常规货币政策在解决发达经济体长期停滞问题方面效力有限，直接影响总支出及其结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将会被更多地使用，扩大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公共投资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可以利用这一契机扩大在发达经济体的海外投资。例如，英美等国都面临着基础设施大规模更新换代的局面，OECD预测2010~2030年全球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将高达53万亿美元。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特别是在英国等国家的政府积极促进中国对本国投资的情况下，中国应当进一步深化企业“走出去”战略，帮助企业适应海外市场规则，全球范围内配置产能，切实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在当下及今后的竞争，将是一场持久的全球改革竞争和创新竞争。当前世界经济进入了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期，重大的科技创新乃至产业革命正在孕育之中，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正在兴起。这对中国培育发展新优势和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要将“结构性减速”视为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内涵，利用增速减缓压力倒逼结构调整与体制转型，充分利用和培育我国在若干新技术研发领域的优势，主动提升制造业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同时全面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方案，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造力，力争比发达经济体更快地完成调整，获取全球竞争新优势。中国有句老话：不怕慢就怕站。中国的增速不在于是7%还是5%，而在于这个增长是否可持续。美国一百多年保持了3%的年均增长，成为全球最大也是最强的经济体。中国增长若能持续，超越美国就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着眼长远，锐意改革才最为根本。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办公室主任、研究员)

# 创业从一个问题开始

□ 常宁

对任何一家需要创新、需要颠覆性力量的公司来说，培养一种“提问文化”非常重要。

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提问者。有一项研究表明，在英国，平均年龄4岁的孩子一天可以问妈妈300多个问题。但是，在五六岁时，大多数孩子的提问开始变少，以后越来越少。4岁似乎成了一个分界线，我们提问数的高峰停留于此。

孩子一开始会每天提出上百个问题，但进入学校后，他们提问的数量急剧下降，因为很多时候学校都是直截了当地给学生答案，而不鼓励他们提问。这些孩子慢慢长大进入社会，最终被驯养成了“守规矩”、“不找茬”的人，再也不会凭儿时本能、凭想象提出问题，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提问会被人看成是不礼貌的、冒犯人的、无知的、没有价值的。

这就是《绝佳提问》(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的作者沃伦·贝格尔想要提醒我们注意的事实：我们生下来就会提问，就对各种新鲜事物保持好奇并提出疑问。然而，我们生存的世界不断告诉我们，提问不是有效率的事，不是好事，谁能直接给出答案，谁才会受欢迎。于是，这种天生的提问能力，在日益繁杂的社会和商业环境中慢慢被消耗殆尽。但是，提问、质疑却是打开创造性思维的最有效工具，那些拥有“提问”习惯的人注定更具有创新性，而大多数丧失了提问能力的人终会归于平凡和普通。

沃伦·贝格尔曾是一名记者，对“提问”和“创新能力”研究的痴迷和执着，让他笔耕不辍。由于记者的从业经历，他得以近距离接触到世界范围内上百个创新型人才。他与这些商业领袖、企业家和创新思考者促膝长谈，了解这些人提出问题、产生原创想法的方式，探究他们成立公司或取得创新成果的心路，了解他们不断寻找问题和探究解决方案的艰难过程。

结果无一例外，这些人都是专家级的“提问者”和“善问者”，有很强的提问能力，而他们创办的企业都源于一个问题。

里德·哈斯廷斯在创办Netflix(一家美国公司，在美国、加拿大提供互联网流媒体播放、定制DVD、蓝光光碟在线出租业务)之前经常从音像店租电影看，但他总是忘了按时还回去，所以必须支付高额的滞纳金。不过，他并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只顾着气愤和沮丧，他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支付这笔钱？紧接着第二个问题接踵而来：如果像健身俱乐部那样用月度会员制运营一家视频租赁公司，会怎样？于是，Netflix诞生了。几年后，哈斯廷斯接着提问：为什么只租电影和电视节目？假设我们自己制作会怎样？于是，Netflix拥有了新的商业模式，且对美国传统电视造成巨大威胁，并与之平分秋色。

相比Netflix，Airbnb(美国一家联系旅游人士和家有空房出租的房东的服务型网站)的故事更让人顿感励志。乔·吉比亚和布莱恩·切斯科这两个家伙起初非常拮据和穷困，他们没有工作，没有钱，只有一个租来的可以睡觉的地方，每个月都很痛苦地想“下个月租金如何支付”。他们注意到，每年商业会议期间，旅馆都会爆满，很多人想找个地方住太难了，于是他们提出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不能住我们这儿？结果他俩把仅有的三个空气垫租给那些人，并有了第一份收入。后来，他们又提出：“假设我们把其他人那些闲置的地方利用起来租给别人，那会怎样？”于是，便有了Airbnb。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宝丽来(Polaroid)到皮克斯(Pixar)，再到潘多拉电台，这些公司的成立都因某个问题而引发。比如，宝丽来起初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非要等那么长时间才能洗出照片？而皮克斯起初的问题则是：为什么动画片不能更加逗人喜爱呢？

这些公司的成立都因创始人提出的一个问题，似乎很简单。但是在后续发展中，不少创业公司允许人们提问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公司慢慢建立了等级制度，有了很多规则，此时还有余地留给人去质疑和提问吗？

有些人认为，如果一个公司允许员工提问太多，公司的模式就会受到挑战和审视，或者公司的权威会受到威胁，或者会让公司进入“不确定”的状态。所以，许多公司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痛恨和害怕这种“被提问和质疑”的情况出现。即便公司意识到要想有创新和发展必须要鼓励“提问文化”，但通常多数公司是不愿意这样做的。

然而，在沃伦·贝格尔看来，对任何一家需要创新、需要颠覆性力量的公司来说，培养一种“提问文化”是如此重要。光是创业领导人充当“首席提问者”还不够，如果也鼓励其他成员提出“尖锐问题”，那么提问、学习和信息共享就会开始蔓延，创新性的想法就会脱颖而出，并很快促进公司的创新实践。

如此看来，谷歌作为全球最具创新的公司之一是有其理由的。谷歌每周五都会在会议室进行完全开放或者说是混乱的讨论会，所有员工都被邀请给公司最高层拉里·佩奇和塞吉·布林提问。这些问题会立即被公司上下的人投票，获得投票最高的问题通常都是最难和最有趣的问题，它们随后会被很快老板们提上日程。

“为什么我必须支付滞纳金？”“为什么我们必须等那么长时间才能洗出照片？”“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地方给别人住？”等等，这些问题的其实任何人都可能提出来，包括你。但是，许多人只会问“为什么”，之后他们并没有付诸行动，只有那些对最初问题不断采取行动的人最终才让伟大的公司呈现于我们面前。

因此，我们不免要问，从这些人提出“为什么”问题到最终形成伟大的创新产品和创新型公司的过程中，到底经历了哪些事情？对于这个问题，贝格尔在对几百位创新人士访谈后，找到了答案。他发现这些人都经历了三个艰难过程，并将其总结为：“为什么/假设…会怎样/结果如何”的三阶段“绝佳提问”模式，并希望人们按照这样的模式培养提问能力。

如果备受国内追捧的《从0到1》是从高屋建瓴的角度告诉我们创新的重要性，那么《绝佳提问》则是训练创造性思维的务实派，它教人们如何通过提问，不断演化到切入点(所谓的0)，教人们如何将(最初的问题)不断演化成多种可能的假设性问题(解决方案)并筛选出适合的那个，最后教人们如何实现这个问题，即实现最终的创新(到达所谓的1)。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博士)

# 都市“新客”的客居困境

□ 陈光裕 徐琴

对于城市“新客”——租客群体而言，他们游走于城市社会的规则和秩序结构中，却如细沙一般难以粘着；他们内部也难以生成认同，成为“距离最近的陌生人”。

城市，盛民之地，买卖之所。自有人类分工起，一些聚落开始脱离农业生产、摆脱原始村落形态，成为区域内交易、防卫的中心。功能的集中也带来了差异的聚集，商人、工匠、军队、官绅以及各种职业者构成了城市人口的主体。这种差异化的人口结构决定了城市居民难以像乡民那样因为长期的共同劳作和相对同质的生活而形成亲密的人际关系，进而形成与“共同体”迥异的“复杂社会”。应当说，城市社会“生而复杂”，有其历史根源。

近代以后，城市人口、规模、数量开始极速膨胀，巨大的集聚效应在推动整个社会结构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同时，也把城市社会这种“复杂性”演绎到极致，形成了“城市性”——一种城市特有的生活图景。在西方城市社会学家看来，人口稠密使得城市居民丧失了对他人“比较有人情味的方面的感受能力”，邻里关系被削弱；高度专业化的机构则使得人们之间的首届交往被次属交往所替代，诸多家庭功能被外移，导致亲属关系纽带减弱，家庭的社会意义功能降低。整体上，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呈现短期性、匿名性、肤浅性和非人格性等特征。

而我中国既有上述西方城市的“通病”，又因为新移民把过去城乡二元矛盾带入城市场域，使得局面更为复杂。譬如城市“新客”——租客群体，他们游走、谋生于城市社会的规则和秩序结构中，却如细沙一般难

以粘着，同时，他们内部也难以生成认同，成为“距离最近的陌生人”。近日，南京明发滨江新城小区的一个群租房内，一名在高新区电子企业上班的30多岁四川籍男租客去世一周后才被同屋的其他6位租客发现，而发现的原因是屋里出现强烈异味。面对记者的询问，屋内其他租客表示平日虽有互动，但仅限于点头之交，几天甚至数周碰不到是常有的事。同住一个屋檐下，几厘米厚的隔间木板却划开了他们的世界，让彼此漠不关心，甚至直到这位男子过世，同住的人还不知道他姓什么。

或许有人会归因于城市社会的特性，诚然，个体性、异质性、匿名性和流动性是现代城市的特点，而人际间的疏离也是城市社会的“通病”，但就租客群体而言，他们又有着与城市住户不同的生命状态和生活逻辑，面临特殊的“客居困境”。

首先，租房对租客只是一种临时性、替代性的选择，属于“手段”和“途径”，获取“潜在收益”——比如方便上下班才是目的，进而行为都需要围绕此事展开，即“选择在此居住是为了更好地做其他事”。对他们而言，是否与他人互动与其租房目的之间就没有必然的关联。一旦工作地点变动，原有的“便利”不再存在，那么必然要考虑更换，这就使得他们很难在一地长期居住，多则数年，少则数月，生计的压力迫使他们时常要考虑“生存”，对工作内容以外的事关注自然不足。与此相反，住戶居住之前当然也考虑上班上学是否便利等因素，但一旦居住成为事实，这些要素便转化为固定的外在条件，且短期内不可更改，因此，居住不再是单纯的途径和手段，而是一种需要维系乃至改善的客观事实，是一种目的，简而言之，“需要做些别的事来让自己在这里住得

更好”。进而，住戶就需要诸如邻里交往、社区活动来改善其居住的“社会生态”，实现购房价值。这种倒置的目的与手段使得租客与住戶有“天然的对立”：住戶不认为租客是“自己人”，租客也没有兴趣与房东以外的住戶交往过多。

其次，房屋拥有者和实际使用者的分离剥夺了居民身份完整性，形成了只具备部分权限的租客，最典型的就是租客一旦与住戶发生矛盾和摩擦，房东往往会卷入，成为前者“代言”。对住戶来说，能够直接与租客解决问题当然最好，解决不了也没关系，找到正主——其房东才是应有之义。而对租客来说，很多问题“不方便”或“不合适”自己出面，尤其是涉及房屋设施时。如此一来，两者之间就产生了一种不对等的身份，虽然并不意味着租客就此“低人一等”，在日常生活中也难以察觉，但在需要“做决定”、“拿主意”的正式事情中，身份不对等就给两者形成心理暗示：对方和我不是一个群体，“身份隔离”由此形成。

另外，虽然住戶之间也存在人际关系冷漠、邻里缺乏互动的状况，但至少仍有两种可作为群体认同的“内核”。老旧小区社区中，当下的居住空间虽然阻断了过去街坊式的邻里交往，但住戶或多或少都会保留某些共同的社区记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于过往生活的认同；而对于新建小区而言，“业主委员会”这一自治组织则为新住戶建构了一种面向未来的认同可能，即大家都成为小区的“主人”。反观租客，既没有与住戶可以共享的集体记忆，也没有成为社区自治主体的可能，在现实中更是被排除各项社区福利之外。往前看，他们没有可与住戶共同分享的历史；往后看，他们也没有可与住戶共同期待的“未来”，两头不着落必然是

一种集体性漠然和失措。

更进一步，虽然租、住之间形成相互隔离的群体，但就租客本身而言，可能还无法成为真正的群体。住戶因为对相对稳定的居住形态和类似的生活方式，因此也有产生“家”和“我们”感的稳定来源，即使身处城市异质环境中，随着时间迁移，总能逐步地建设人际关系，尽管过程可能比较漫长。而住戶的生活方式是流动的，其内部差异性、匿名性更高。来自天南海北，操持不同口音，从事不同工作，心怀不同期待，仅凭“租客”这个有别于住戶的标签很难形成群体认同，甚至其群体内隔离都要高于群体间隔离。

群体内外都无法产生认同的租客们便如一个个“原子”，游离在城市之中。作为群体，他们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政策关注；但作为个体，他们与其他人缺乏基本的互动和关怀，精神无处安放，客居困境则紧紧缠绕着他们。隔离的消除已经不是公共政策力所能及的，而是要从文化和心理上培养他们主动交流、扩大互动并互相关怀的城市适应力。

(陈光裕系河海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徐琴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